

巴蜀移民史

付宇平撰

谭红 主编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巴蜀移民史

谭红主编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蜀移民史/谭红主编. —成都:巴蜀书社,
2005. 12
ISBN 7—80659—809—X

I. 巴... II. 谭... III. 移民—历史—研究—四川
省 IV. K29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6202 号

巴蜀移民史

谭红 主编

责任编辑	陈红
装帧设计	邹小工 柏小坡等
出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省卫干院印刷厂(028)86158404
版 次	2006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210mm×148mm
印 张	25.375
字 数	680千字
书 号	ISBN 7—80659—809—X/K·130
定 价	4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序

四川（包括今重庆市）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省份，无论是从一个史学研究者的专业角度，还是出于一个“湖广填四川”移民后裔的感情，我对四川移民史的研究，一直都非常关注。全国移民史研究的兴盛，已经有近二十多年的时间。可惜的是，四川的移民历史并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在全国性的移民史专著中，有关于四川的章节；在关于四川历史的专著中，也涉及移民的内容；在许多专史性的著作中，也都讲到了移民的影响；当然还有不少研究四川移民史的专题论文。但是，就是没有一本全面、系统地论述四川移民史的专著。因此，在几年以前，当一些中青年学人来邀请我做《巴蜀移民史》这样一个课题的顾问时，我非常乐意地接受了。

三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我看到他们的结题成果——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四川古代移民史，在课题评审会上被专家们认为“具有填补空白的学术价值”，我感到十分欣慰。

记得在第一次课题开题报告会以及课题中期成果汇报会上，我都表述过这样的意见，四川的移民历史时间长，头绪繁，涉及广，影响大，在现有研究中尚未解决的问题也多，因此，这一课题的研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但同时这也意味着课题组所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所以必须要有新的思路，

要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要去发掘新的史料。其他的顾问也提供了许多好意见。从今天课题组写就的文稿来看，对明朝以前传统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的详细利用，对明清以来档案、家谱等新材料的合理吸纳，对多学科新理念的运用，使本书成为跨学科、多层次研究巴蜀移民史之重要著作。本书作者较为深入地阐述了移民入川对四川古代社会发展的多方面影响，探讨了移民对于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巨大作用，明代卫所移民等方面的研究也提出了一些具有新意的见解，研究者们的这些努力确实取得了突破，值得肯定，整体水平也达到了预期目标。当然，我更寄希望于课题组，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以更大的努力去继续探索这次课题研究中尚未来得及深入研究解决的问题。须知，史学研究正是依靠这一程一程地跋涉，去接近明了事实、重构历史的主峰的。

重庆市移民局和重庆市文化局在负责主持三峡移民工程的同时，能够与四川大学的史学工作者合作，将此课题立项并给予资助，极有眼光。从对历史上四川移民的研究中，我们可以获得对今天的移民工作仍有借鉴意义的经验教训，对于在移民区建立和谐社会的努力不无裨益。在课题研究的过程中，移民局进行了严格的管理、检查和审核，这对于保证课题研究的质量，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措施。与此同时，移民局又根据研究工作的特殊性和具体进展情况，适当放宽了原定的起讫时间，在课题形成书稿后得以较为从容地修改。我相信，这种做法符合史学研究工作的实际规律，也会使课题成果更趋完善。

临窗草此，以为序言。

隗瀛涛

2005年8月21日于四川大学桃林村

绪 论

移民作为人类的迁徙现象，对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四川（为了叙述方便，本书所指的四川包括今四川省和重庆市）作为一个移民省份，在历史上出现了多次移民高潮，尤其是民间广泛流传的“湖广填四川”，规模大，时间长，影响深远，当今川渝两省市70%以上的人都是那批移民的后代。当前，重庆市正在进行举世闻名的三峡工程百万大移民，历史上的移民对四川的社会经济发展有什么影响，对当今的三峡移民能否有所借鉴，四川大学的史学工作者与重庆市移民局都对此产生了兴趣，于是决定共同协作研究。本研究课题于2001年获得重庆市移民局正式立项，并纳入四川大学社科横向课题管理。课题组成员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工作，形成六十余万字的研究成果，最终以《巴蜀移民史》为书名出版，以期与广大的史学爱好者交流，并作为当今移民工作者的参考资料。

一、课题研究的意义

自东汉末年以来，四川就有“天府之国”的美称，它以其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成为先民世代代的劳动生息之地。外省移民入川是四川人口史的一大特点，从秦汉至明清的两千年间有多次颇具规模的移民入川。其中尤以清代前期发生的“湖广

填四川”规模最大、人数最多而影响最为深远，这次移民使地荒人稀的四川起死回生，出现了社会经济的再度繁荣。这是清政府顺应历史形势的明智之举，也是康乾盛世的政绩之一。移民作为四川开发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为四川地区的社会经济逐步恢复和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对移民入川的历史背景、移民的来源和动机，历代政府对移民的鼓励或限制的政策，以及迁徙的过程和移民的效果等方面的问题作深入的研究和探索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

当代中国人口的迁徙和流动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转型的关系也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广大贫困地区打破封闭，摆脱人口困境，保证人口长期稳定健康发展以及我国城镇化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是政府部门和学术界面临的重要任务和新兴课题。本课题在掌握了大量的较为系统的移民史料的基础上，通过对四川历代移民，特别是明清移民问题的深入考察研究，多角度、全方位地揭示其人口迁徙产生的动因及过程，人口迁徙与当时的政治局势、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状况、文化交流、风俗变迁及民族融合等方面的关系，总结其经验教训，并力图从改革发展稳定的高度对当代人口迁徙问题进行探索与思考，以期对当前三峡库区移民的有序流动和社会发展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因而本课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古代的巴国与蜀国在地域上相互毗邻，在文化上也相互渗透，巴蜀文化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化概念绵延几千年，至今仍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力，最新的考古发掘也再次证明了巴蜀文化深厚的历史渊源。“四川”作为一个行政区划已有千年的历史，本课题以古代四川地区有史料记载的移民活动为研究主线，以明清两代移民活动为研究重点，贯穿各个时期与移民迁徙活动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和风俗文化等方面的内容，通过对纷繁的移民历史现象和事实的梳理、分析和深入研究，充分认识历史，寻求规律，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使我们能够从历史的高度清楚地看到

社会的变迁和进步，审视四川作为一个移民省份存在的优势和劣势，为我们今后社会发展的顺畅通达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内容。作为一个有关四川移民问题的研究课题，虽然在浩如烟海的史学研究成果中只是沧海一粟，但到目前为止，在史学界还没有一部系统阐述四川移民历史的专著，说明这一研究内容极为丰富的领域尚未得到充分开发，课题组成员正是以科学的态度和求实的精神勉力完成了这个初始的研究工作。因此，作为第一部较为完整地论述四川地区移民历史的通史性质的著述，本课题的研究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二、课题研究的范围和方法

本课题时间跨度从先秦巴蜀王国时期延续至清代中叶，即从四川历史上有记载的移民活动开始，到清代的大移民进程接近尾声之时。应该说明的是，本课题没有给移民一个定义是因为其本身的含义丰富而又有诸多不确定因素难以界定，如人口数量问题、迁徙距离问题、迁移的目的性问题、是否落籍或何时落籍的问题，以及有无职业或谋生手段等等，因此，课题组达成共识，确定了一个最为宽泛的移民概念，并以此为原则进行史料的筛选、研究和写作，事实上，在研究中似乎并没有因移民概念不确定而影响了写作进程。课题研究旨在梳理出一个明晰的四川移民历史的线索，以历代大量的外省籍移民入川为主要研究内容，将各个时期移民迁徙的原因、移民的地域来源、移民的迁徙路线、移民的分布，以及移民的组织管理方式和相应移民政策的实施情况等作了较为全面的叙述和分析，在此基础上着重论述了移民入川对四川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和产生的深远影响。

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特征，历史上移民人口的流动和移民潮的兴起无外受朝代更替、政局不稳、社会动荡、战争频繁、自然灾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且一般都是社会和自然两方面的原因同时作用，才会造成一个时期大

范围的人口锐减和土地荒芜、民生凋敝。直到新一轮移民的到来，重新开垦土地，激活社会经济，带来新的繁荣。四川盆地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是中国首屈一指的既富饶又安全的地区。每当和平安定时移民则入川开发以求发展；每当战乱灾荒时移民则“避难入蜀”以求生存。如在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战争时期，战乱几乎没有波及四川，因此在西汉初年，巴蜀地区成为了中原居民避难的理想之地，由此出现的大批移民形成了四川移民史的第一个高峰。再如明末清初，当四川成为张献忠农民起义的主战场时，四川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社会经济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四川靠自身的人力物力已无法恢复元气，这种情况客观上为新移民的到来形成了先决条件。这样一片“移民乐土”，对以寻求土地为目的的大批外省农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由此形成了四川历史上移民人口最多、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被称之为“湖广填四川”的清代大移民，其影响之深远至今仍妇孺皆知，老少能言。

通过对四川移民史的梳理，本课题对移民的地域来源和入川移民人口的走向和分布有了一个较为明晰的了解，对历代四川人的不断重新组合也有了较为全面和深刻的认识，事实证明，四川这个人口大省是历代移民不断填充的结果。

从秦代“万家实蜀”开始到清代的“湖广填四川”，四川人口数量如波浪般起伏不定，在秦、西晋、南宋、明代和清代分别出现了几次人口高峰，这与大批外省籍移民的迁入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从人口迁移的数量和规模来看，四川人口迁移呈现出以迁入为主，以迁出为辅的流动特点。本课题对各个历史时期外省移民入川的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重点论述，对川民外迁史实也作了一些简要的论述。如西晋成汉时期梁、益二州的蜀民向荆湘地区外迁问题。入川移民迁徙在部分时段也涉及移民入川后在四川境内的流动情况，如清代移民入川后呈现出由川东向川西再迁移的过程。

从移民地域来源和时代特征来看，南北比较，自秦汉时期大批中原移民入川开始，来自中国北方地区的入川移民几乎历代都有，西晋的“僚人入蜀”才第一次出现了来自南方地区的大规模的移民。东西比较，隋唐时期第一次出现了来自中国西部地区的党项、羌、吐蕃等少数民族移民进入川西高原地区，而来自中国东部地区的移民入川则晚到元代才有出现，到明清时期已成为入川移民的主流方向。

以四川历代的几次移民高峰为例，入川移民的分布体现了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分布趋势。秦移民入川后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西部，即成都平原地区，秦时期巴蜀地区郡县的设立就是很好的佐证。西晋“僚人入蜀”是四川移民史上南来移民的典型例证，其分布几乎遍于四川盆地。在唐末五代的移民大潮中由北方入蜀的移民已越过了川西平原到达了川东、川中的长江流域。明代部分的研究表明，四川各时期州县的新增或复置的情况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夏、洪武及明中后期的移民分布情况，明代的罪徙移民和卫所移民则可根据卫所的设置推断其分布的区域以成都地区向西北、西南地区呈放射状。

综观四川移民历史，在清以前，没有一个朝代的入川移民有如此丰富的地域来源，在清代延续了近一个世纪的移民大潮中，以湖广人为代表的移民来自四川东、北、南三个方向的十余个省份，他们通过水、陆两种途径入川，并通过入川后多方位的再迁移，其分布呈现出较为复杂的状态。以嘉庆十七年（1812）四川人口统计数据排序，人口在10万以上的府有7个，依次为成都、重庆、宁远、顺庆、嘉定、叙州、潼川府，其中成都、重庆两大区域中心府人口总数占全川人口总数的28.23%，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实际上，“湖广填四川”已经成为清代大移民的一个特定的代名词，这次人口的大汇合大交融诞生了一个新四川——一个以移民人口为主的省份从此高居全国人口数量的首位，直到1997年重庆从四川划出为止。

课题组在研究中根据顾问的指导，始终遵循两个基本原则进行撰写：第一，材料多的多写，材料少的少写，没有材料宁愿不写或存疑；第二，有见解的多写，必须论及而无多少新意的问题做简要的论述，其目的是保持书稿移民史的特色。从资料准备情况来看，课题组坚持从原始材料入手，注意从古代典籍和方志中寻找有关材料，广泛阅读了包括人口、民族、城市、商业、农业、法律、生态、气候、交通、教育、宗教等多方面内容的古今著述，在研究中注意从多学科的角度进行资料分析和利用。本书的论述多建立在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特别是对民国以前的地方志文献、时人文集、家谱、碑牒、出土文物、碑刻、官方档案的使用，为本书的立论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如本书第8章，作者搜集了1400余个移民家族的材料，其中确定为元代末期至明代迁徙到四川的有900多个移民家族，在翔实史料的基础上，考察了这一历史时期四川的移民活动，从移民史的角度对明代四川移民问题研究有所补充。本书结合了历史学、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等领域的方法，尽可能地进行了跨学科的全面研究。如本书第1章对于四川自然概况的描述，乃是希望结合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以对移民问题作出多维度的考察；本书第8章和第10章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对州县裁并和城池兴废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本书第13章对于宗族问题、民间信仰问题及移民社会形成问题的研究，则受到了人类学、社会学思路的启迪。课题组在研究方法上的借鉴和尝试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研究的视野和范围。

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课题还有诸多重要问题没有展开论述，以清代四川移民问题研究为例，如：清代四川的租佃关系问题、土客纠纷问题、咽喉和袍哥产生问题、川戏和四川方言问题、满城问题、客家问题、明末清初四川人外迁问题、移民入川对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问题、移民与生态环境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极大空间。

三、移民的类型与特点

四川历代移民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细分起来情况十分复杂，归纳而言，其中以政治或军事需要为目的由政府安置的移民可称之为政府行为的移民，以民间自发流动迁移为特点的移民可称之为民间行为的移民，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政府行为的移民是从国家政策的整体利益出发，因此带有强制性和被迫性。民间行为的移民则更多从个体需要出发，因此带有自主性和随意性。这两种性质的移民在四川历代移民中表现为不同的类型，这些类别的移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各个时期四川移民的特点。

自发性移民是移民中数量最庞大的群体，其中土农工商四业中农民占绝大多数。在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就是农民的一切，农民因社会或自然的原因离开土地进行迁移，其目标仍然是寻求土地，哪里有可供开垦的肥沃土地，他们就会流向哪里。以清代移民为例，清初四川社会的土地状况正好符合了他们的这种首要需求，于是大批的外省农民蜂拥入川，“插占为业”，形成了四川历史上蔚为壮观的清代移民大潮。

仕宦移民是一种典型的政府行为的移民，几乎历代都有因为官而入籍的现象，但在移民数量上不构成当时整个社会移民的主流，只有元代是一个例外。元代蒙古贵族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国，为了有效地加强对广大汉地人民的监控和统治，多数行政机构都必须任用蒙古人为达鲁花赤，汉人则不能任正官，因此，元代四川的各级政府官员中蒙古人、色目人和北方汉人至少占三分之二以上，故仕宦移民在元代是一个较普遍的现象。

军事移民作为政府行为的移民以历代的军屯为代表，以在边防地区驻扎军队和开荒屯粮为形式，达到使边疆长治久安的目的，明代军田带来的卫所移民是明代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罪徙移民是一种由政府组织安排的惩罚性移民，其政治、军事的意义十分明显。由于蜀道艰难，出入不易，这种特殊的地理

环境使巴蜀之地成为迁徙安置罪犯的理想场所。如秦汉时期迁往蜀巴的中原移民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是“迁虏”的罪犯，他们成为同时期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以流刑和充军两类刑律被成批贬往四川边荒之地的罪犯也不在少数。

民族移民是指四川历史上少数民族移民进入汉族地区、汉族移民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迁徙。这类移民有政府借助军事力量进行的人口迁徙，也有和平时期政策鼓励下的人口迁徙，如汉代对西南夷地区的开发，隋唐之际的吐蕃移民迁入川西高原，清代汉族移民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这种民族地区间的人口迁移客观上加强了民族的交流和融合，对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事实上，四川移民活动伴随着两千多年的历史从未停止过，直到今天仍然在继续。与历史上的移民类型相比较，当今之三峡移民是以经济建设为目的，可称为项目开发型移民，这种类型的移民在四川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上都是前无古人的。当今三峡百万移民的时代背景、政策目标和实施方案都与历史上特别是封建时代的移民活动不可同日而语，就移民迁移方式而言，与历史上四川移民的迁徙方式也有所不同，历史上的移民都是较远距离的迁徙，而三峡移民大部分是按照就近后靠的原则进行迁移，而且是在政府组织安排下进行的有序迁移。三峡移民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有各司其职的移民管理人员，有专款专用的移民经费，这是历史上所发生的移民所无法类比的。当然，三峡工程和三峡移民也将在今后的岁月中接受历史的检验和褒贬。

本课题以四川社会历史为研究的切入点，把移民入川后的活动放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加以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到移民对四川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方面产生的积极影响。以秦移民入川为例，公元前 315 年秦灭巴蜀后，随着中原移民大规模的迁移入川，最重要的成就表现在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修建和铁制农具的引入，极大地扩张了农业的生产能力，从而全面促进了四川社会

生活的发展，也为四川融入中原先进的华夏文明奠定了农业物质基础。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农业先进工具的不断进步，秦朝移民入川后，四川的制铁手工业也获得了开启，并由此刺激了四川的冶铁业发展。就商业而言，在自发性移民的迁徙中，有一部分是“贸迁入蜀”的移民，他们自入川之始就已经对四川的商业产生了影响，到后来移民对四川商业贸易的积极作用就更加显而易见。据清代巴县档案嘉庆初年的调查统计，当时重庆城领有牙帖的商人或掮客共 109 行，从其商人的原籍分布看，几乎全部为外省人，可见入川移民与四川商业的关系十分密切，并由此可知移民对四川商业的积极推进作用。

从秦代的“万家实蜀”到清代的“湖广填四川”，四川几千年的移民历史既是四川社会大动荡后人口减少与社会凋敝的一种补偿形式，也客观上对四川的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意义，移民在开发资源，拓展疆域，保存人口，提高人口素质和促进民族融合等诸多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四、政府在移民过程中的作用

三峡工程带来的人口的迁移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转型，更广泛意义的人口流动越来越多，这种变化带来的社会问题正日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怎样使这一流动向积极有序的方向发展，尽可能地避免其带来的一些社会控制问题，成为政府部门和学术界面临的重要任务和新兴课题。作为重庆市移民局正式立项课题的研究成果，本书在注重学术性的同时，尤其注意到历代四川移民、特别是明清两代移民活动的时代启示意义，以期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对于政府来说，如何有效地管理与引导移民历来是一个重要问题，各个历史时期的移民入川，由于其性质各不相同，所以，历朝政府对入川移民的管理是不同的，具体体现在宏观政策的指

导与具体措施兑现上也都是不相同的。但是，大方面的政策导向和组织管理也有一些共同点。本书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提供了这方面的不少启示。首先，政府在导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必须态度鲜明，对民间自发性的移民活动予以支持。其次，政府出于经济发展目的组织的移民活动，在组织实施上一定要地方官负责，具体措施也要落实到位。第三、物质的奖励和刺激是移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证。第四，政府要认清形势，通过修改政策对移民活动加以指导和规范。例如清政府时期，外省籍移民入川中就有咽噜害群之移民，清代地方官发现并明奏“四川咽噜子多系福建、广东、湖广、陕西等省流棍入川”。对此清政府采取了各种各样手段，由最初的“无照，阻回”，或者“严缉”，更甚者直至“荡平”。从而消除了社会不安定因素，维护了整个移民政策的权威性和移民行为本身的合法性。

再以距今时间最近、影响最广的清代移民为例，清初的移民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土地的优惠；第二是赋税的优惠；第三是对官员的奖励；第四是对移民的鼓励。政府不仅在土地和赋税方面给予移民优惠政策，而且从一些根本的问题上解决了移民的后顾之忧，例如土地的所有权、家庭主要成员的户籍、移民子弟的入学考试等方面的实际问题。有了相应的政策依据和政府行政管理上的保证，为移民的大规模入川创造了条件，因此可以说，清初大规模的移民填川是移民政策的产物，招民垦荒政策的全面实施成为清初四川经济起死回生的起点，带来了四川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复苏，挽救了一个濒临荒废的省份，其巨大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四川是内陆大省，也是中国西南边陲的多民族省份之一。历朝历代的移民入川不仅对汉族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对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从而与少数民族在各个方面展现出融合的态势。特别是明末清初大规模的移民再次入川，开始了又一次民族关系的融合，在这个过程中，外省籍移

民入川对少数民族聚居区依然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在清政府政策的引导下，汉民族移民逐步进入到四川少数民族聚居区，为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例如：康熙五十年（1711）宣布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虽然是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但对这一时期四川人口的增长具有特别的意义，对移民入川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也带动了汉民族向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迁移潮流。“按户授地”是鼓励移民迁入川西北主要是藏族聚居的山区。开垦荒地，“永为世业”是雍正八年（1730）四川巡抚宪德针对羌族聚居地区特殊情况奏请的主要措施。“贷给牛种”是其时叙州知府采取的扶持移民迁入主要是土家族和苗族聚居地区的措施。直接“拨给地亩”是地处川北山区的懋功直隶厅属绥靖屯所辖“绥靖、庆宁两营”和懋功屯所辖“懋功营”中安插屯民、屯番等不同状态的户的办法。由此可以看到，移民入川对发展与稳定四川边区的经济与社会，其作用是巨大的。

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交流与沟通需要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其中清政府的政策也随着历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转变并发挥了相当的引导作用。例如清前期四川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民族地区之间的关系，以及少数民族地区行政管理与清中央政府的关系，在清中期以后获得一定的稳定与发展。其最为主要的原因至少有三：第一是清政府的军事“弹压”和其后的军兵驻防与屯田；第二是招安、抚慰、鼓励、奖励并利用当地权威机构代理管理少数民族地区，并实际给予当地少数民族群众一定的物资帮助；第三也是最有现实影响和长远影响的，就是汉民族移民迁居进入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如果说清政府军事力量打开了四川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形式上封闭的大门，那么汉民族迁居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不仅开发了少数民族地区，获得了一定的可见的经济利益，而且也将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生产方式带进了四川少数民族地区，致使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经济基础与生产力，乃至整个社会获得了重要的进步。

政府的鼓励和优惠政策在清初起到了引导移民入川的作用，并使相当一部分移民定居下来，带来了四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移民作为一个求生存求发展的群体，不管是自发性的移民还是政策鼓励下的移民，其活动状态都不是静止的，实际上移民活动一经发起，就呈现出一种自然流动状态。清代“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就是以这样一种不可遏制的趋势发展着，当众多地方官连连上奏，对四川已出现的“人满为患”的移民情况忧心忡忡时，中央政府没有对四川的人口发展政策作出及时的调节和有效的控制，况且封建时代的帝王素来认为人口繁茂是盛世的表征。但是，正是清政府这种默认的态度最终导致了四川人口居高不下，从此背上了沉重的人口过剩的历史包袱，对未来四川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使历来以人杰地灵著称的四川沉沦于温饱挣扎中，在清一代没有恢复元气。因此本书对四川移民史上一些具有规律性的现象做了归纳和分析，不仅注意到移民为社会带来的正面影响，也注意到其负面效应，如人口压力所造成的生计问题、土地的过度开垦问题、原籍不同的移民因风俗习惯的差异而产生的社会治安问题等，这些不仅具有学术意义，也对我国现阶段的移民政策制定和社会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最后必须论及的是移民入川对四川人地关系紧张的影响问题。随着外省籍移民入川导致的四川人口规模扩张，到清朝中期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在农业耕种方式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条件下，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可资利用的熟地资源的人均占有水平逐步下降。甚至连富饶的成都平原也如此，如成都府新都县，“昔之蜀，土满为忧；今之蜀，人满为患”。这种人均占有耕地水平下降的情况在相对稳定的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只有可能产生两种进一步的恶果：其一、入川移民更大规模地开垦荒地，保持人均占有土地水平不再下降，以保持原有的生活水平不变，从而加剧破坏自然生态环境；其二、入川移民的生活水平随